



祖国丛书

邹容和陈天华

陈旭麓 费成康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祖国丛书

邹容和陈天华

陈旭麓 费成康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本书前篇原名《邹容》，是本社出版的“中国近代史丛书”中的一种。这次作了若干修改，与《陈天华》合编为一书，收入“祖国丛书”。

责任编辑 曹文娟
封面装帧 沈蓉男

邹容和陈天华

陈旭麓 费成康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绍兴路54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75 插页 2 字数 70,000

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9,000

书号 11074·641 定价 0.55元

我们的祖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，是养育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母亲。

编辑出版《祖国丛书》旨在全面、形象、真实地展现祖国的风貌，帮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，加深对伟大祖国的热爱，焕发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。

丛书的主要内容，有祖国的建设新貌、悠久历史、锦绣河山、灿烂文化、科技成就和杰出人物等。它以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读者为主要对象，编写上力求形式新颖、通俗生动、图文并茂、雅俗共赏。

这套丛书由人民出版社、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三家共同出版。第一批选题约一千种，计划每年出书一百种左右。



书号 11074·641

定价 0.55 元

目 录

邹 容

- 1 风雷激荡的年代 (1)
- 2 在风浪中成长 (8)
- 3 “游海外，留经年” (15)
- 4 思想战线上的“马前卒” ... (20)
- 5 《革命军》的出版 (29)
- 6 《苏报》案 (39)
- 7 为革命献出青春 (46)
- 8 《革命军》和革命潮 (54)

陈天华

- 1 “莫谓草庐无俊杰” (60)
- 2 从反帝爱国到反清革命 ... (68)
- 3 成为革命党的大文豪 (72)
- 4 策动武装起义 (80)
- 5 参与发起同盟会 (86)
- 6 投入对改良派的大论战 ... (93)

7 为警醒国人而蹈海 (102)

8 警世之钟长鸣 (109)

附录 邹容和陈天华

生平大事年表 (113)

邹 容

1

风雷激荡的年代

当历史刚刚揭开二十世纪的序幕，中国人民掀起的民主革命激浪，给投靠帝国主义的清朝封建专制政府敲起了丧钟。当时许多知识青年，是这一时代的号角。他们作为一支不可战胜的新生力量登上历史舞台。他们热爱祖国，奋不顾身，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等恶魔斗争，把革命推向前进。自署为“革命军中马前卒”的邹容，就是其中很出色的一个。

邹容，小名桂文，又叫威丹、蔚丹、绍陶。1885年，即中法战争失败的那一年，出生于四川重庆城内。那时重庆府的府治与首县巴县同城，故也称他为巴县人。这里万山重叠，长江上游的急流由此奔腾东下。在邹容成长的年代，中国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灾难和苦痛。侵略和反侵略，压迫和反压迫，新和旧的斗争，一浪接一浪地翻腾，整个社会在激



邹 容 像

荡中。

历史上称为“天险”的四川，雄踞祖国的西南。那时，四川虽然还不是帝国主义武装直接逞凶的地区，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先锋——传教士，早就深入到了这里。1876年签订的中英《烟台条约》，规定英国可以派员常驻重庆；又附专款一条，规定英国还可派员由北京动身，遍历甘肃、青海一带，或由四川入西藏，直达它的殖民地印度。外国侵略者已将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，列入他们的侵略日程。

1894年，日本军阀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，清朝政府的军队大败，李鸿章吹嘘为“御外侮亦无不足”的北洋海军，全军覆没。结果签订了割地丧权、损失惨重的《马关条约》，台湾被霸占，东北被推向虎口，重庆等地又被开放为通商口岸。此后，作为西南重镇的重庆，也成了外国侵略者的据点。他们在这里辟租界（日本），派领事，驻兵舰，开洋行，设工厂，盗矿产，测航道，勘铁路，外国商品也上溯长江，大量输入四川。来到四川活动的外国侵略分子，与日俱增。这时，邹容已开始晓事，《马关条约》的严重后果，后来在他的论著中，有极为强烈的反映。

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失败，在十九世纪最后的几年间，“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”，中国的处境已惶惶不可终日。帝国主义纷纷租占港湾，掠夺铁路，划分势力范围，“万国报馆议论沸腾，咸以分中国为言”。（康有为：《上清帝第五书》）人们警惕地指出，帝国主义对于中国，“譬如春蚕之食叶，边境完而后及于中心”。（《四川》杂志）四川等地，正是这种将被“蚕食”的中心。

为了救亡图存，资产阶级改良派于1898年掀起戊戌（wùxū 物虚）变法运动，革新和守旧两种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。顽固派很快发动政变，反扑过来，杀了维新人士的头，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。

十九世纪末了的一年，1900年，中国人民在华北发动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，声势及于全国，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瓜分阴谋。而这一年，在长江中游，有资产阶

级改良派最后一试的唐才常自立军起事；在南方的广东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，又发动了反清的惠州起义。所有这些，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和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势力，都在积极谋求改变现状，为中华民族寻找新的出路。

就在这时，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竟纠合八国侵略联军杀进中国，镇压义和团运动，把中国人民投入血泊火海之中，并在南方进行分裂活动。清朝政府则撤去一切民族防线，“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”，1901年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拍卖大量主权的《辛丑条约》。它已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机构——“洋人的朝廷”，更加匍匐(púfú 蒲伏)于帝国主义脚下。

政治上的严重压迫和奴役，必然伴随着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和勒索。以邹容的故乡四川为例，还在八十年代，丁宝桢担任四川总督时，他向皇帝奏报说，四川的捐税“正供(指田赋)之外，有按粮津贴，计可得六十万两；津贴不足，则又按粮捐输，计可得八十余万两”；但“率之常年捐输而仍有一百二、三十万两”不敷，又不得不以别的捐输名目取之于民。(《丁文诚公奏议》)这些叠床架屋的捐税，已经压得四川人民喘不过气来。而甲午战后几年间，由于帝国主义的重重勒索和清朝政府的竭泽而渔，仅从加在全国人民身上、由各省人民分摊的三个大项目中，就可以看出那种不可终日的情景。这三个大项目，一是1897年清朝政府为归还俄、英、德、法四国借款每年本息银一千二百万两，规定四川按年分担九十四万两；二是1898年清朝政府为筹还《马关条约》最

后一期赔款，发行昭信股票（公债），四川要分担银一百零四万七千余两；三是庚子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，规定由各省分担，四川每年要摊付二百六十一万八千两。还有种种巧立名目的捐税，和官吏的层层榨取，就更无从计算了。所有这些情况，在邹容的论著中，都作了无情的揭露。

清朝政府的倒行逆施，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断反抗。四川余栋臣在 1894 年和 1898 年两次武装起义，就很有声势。后一次得到广大群众的响应，震动了川东一带。当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时，四川义和团也四处传布揭帖，提出“灭清、剿洋、兴汉”的口号，驱教士，毁教堂，打击了在四川的外国侵略势力和勾结帝国主义的封建统治者。所以，清朝统治者一再惊呼四川民情浮动，日子很不好过。

邹容生长在这个时代，和那时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样，是很苦闷的。但这个时代和环境，也给了他磨练的机会。

十九世纪最后几年的中国历史是十分沉痛的，中国人民的革新尝试和反抗斗争，都失败了。然而，中国人民决不会就此停住自己的脚步，他们在二十世纪初年展开了新的斗争。

本来，从甲午中日战争时开始，孙中山已经在檀香山和香港组织兴中会，在广东进行反清的武装起义。但还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，斗争的规模狭小，影响不大。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揭起的维新变法旗帜，在当时政治生活中，却具有全国性的影响，很多人对他们寄予希望。经过戊戌政变，和国内外反动派对义和团运动的联合镇压，清朝政府腐败和卖国

的面目已彻底暴露。人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“其君则盗魁也，其官吏则群贼也，其朝署则割地鬻(yù 与)权所也。”(《醒狮》杂志)那是说，再也不用去要求清朝政府搞什么维新变法了，而应采取革命的手段，把它推翻。可是，资产阶级改良派头目康有为，仍然抱着改良主义的主张不放，在国外组织保皇会，要保救被囚禁了的光绪皇帝，说什么：“皇上之不复位兮，中国必亡；皇上之复位兮，大地莫强”。(《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列》)以中国的兴亡，决定于光绪的能否复位，完全是一派皇权主义的主张。1903年，康有为在周游欧、美各国之后，又发表了《答南北美洲诸华侨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》，大弹改良、保皇的滥调，说中国只能搞君主立宪，不能革命，若要革命，就会招致亡国。他的门徒把这封反对革命的长信，标为《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》，印发国内外，蛊(gǔ 古)惑人心。因此，是拥清还是反清，是保皇还是革命，就成为中国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后劈头遇到的一个大问题。

梁启超在《清议报一百册祝词》一文中，说过一段话：“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相交点之一刹那顷，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，短兵相接，而新旧嬗(shàn 善)代之时也。”不少论著曾经引用这段话，来说明从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时，中国所处时代的特征。从形式上看，它表达了那时新旧“相搏相射”的紧迫气氛。但是，梁启超站在保皇的立场上，仍然把改良、变法看作新，仍然只以改良、变法，和保守、顽固作为两异性“相搏相射”的对立面，而抽掉了革命和改

良的“新旧嬗代”，是对革命和改良“短兵相接”这个最富时代特征的新质态的抹煞。

因为，二十世纪初年的新、旧斗争，同十九世纪后期的新、旧斗争，有了不同的内容。不仅原先的保守派是旧的，就是曾经标榜革新的改良派，也正在褪色，包括梁启超自己在内。所以，后来人们称这派人为“老新党”。近代中国是一个激烈变化的社会，新陈代谢特别快，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，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。而“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相交点之一刹那顷”，更是这种激烈变化的年代，波涛汹涌，奔泻千里。人们是迎着变化的时代前进，还是停住自己的脚步，不能不受到时代的检验。

年轻的邹容，正是在这个激烈变化的年代里努力学习和积极活动的。他从前一场新、旧斗争的感受中，立即冲向时代的前头，迎接民主革命又一场新、旧斗争，而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一辈的勇敢战士。

在风浪中成长

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，大量表现为新、旧斗争。人们经常在这种斗争中表演，为这种斗争所考验。新，不是口头的，更不是自封的，而是决定于对一切应兴应革的事物采取什么态度。

学堂和科举之争，即新学和旧学之争，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社会新、旧斗争重要的一环。邹容就是在受教育过程中，从对旧教育的鄙弃而进入斗争行列的。

邹容六岁开始上私塾，经过几年努力，很快读完了封建教育规定要读的“四书”“五经”，并已读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班固的《汉书》等历史名著。他的父亲邹子璠(fán 烦)，设商号于重庆，将四川土产品运销宜昌、汉口、上海，又从江浙买进棉布、洋纱，运回四川出售，并贸易于陕西，是个颇饶资财的旧式商人。他看到邹容聪明向学，很希望邹容在科举考试上下工夫，一级一级考上去，取得功名，以光大邹家的门第。

邹容十二岁那年(1896)，跟着哥哥一同参加巴县的童子试。童子试就是童生考试，是学做八股文章、参加科举考

试的第一步，属于童年应试的一级。但是，有许多人多次参加这种考试，没有考上，考到长了大把胡子，仍然叫做童生。不过人们给他们添上一个“老”字，呼之为“老童生”。就算考得顺利，也要经过县试、府试、院试等多场考试，场场中试，才能考上一个秀才。然后考举人，考进士，逐级应试。不知有多少人，被这种无用的八股文，考掉了青春和生命。

邹容在临试时，有的考生对词意晦涩的题目不甚了然，要求主考官解释，被拒绝。邹容忍不住站起来，同主考官辩论。主考官恼羞成怒，说邹容违犯场规，要差人打他手心二十板。邹容指着主考官大声说：“我得罪的是你，为什么要差人打我？要打你来打。”说完愤而退出考场。他第一次参加考试，就和这种束缚思想的八股考试制度发生了冲突。

这时，酝酿已久的维新思潮，正在发展为维新运动。维新之风，已由北京、上海和广东、湖南等地，吹到了巴山蜀水。邹容得以接触严复译述的《天演论》、梁启超等主编的《时务报》一类著名的维新书刊。四川的宋育仁，也在这种风气下创办了《渝报》，刊出他的《时务论》。接着，成都成立“蜀学会”，发行《蜀学报》。时代的启示，思潮的奔泻，革新要求很快在邹容的思想深处发了芽。当他父亲一再以认真赶考的话向他说教时，他坦然回答道：“臭八股儿不愿学，满场儿不爱入，衰世科名，得之又有何用！”表明了年轻一代正在向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挑战。

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步步深入，深处内地的四川也岌岌可危，中国已没有一块安全的地方。而在清朝统治下，

整个社会仍然是那样闭塞落后。邹容感到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不但要知道中国，更要开眼看世界，向世界寻求知识。于是便同一些青年，跟来到重庆的日本人学习日语和英语，并学习西学。他在课外如饥似渴地阅读书报，渐渐懂得国内外的大事，写起文章来，发挥议论，日有新意。在谈论时事时，他对那些腐朽的冬烘先生，不问其身份如何，常当面加以驳斥。

1898年9月，戊戌政变发生，维新人士有的被杀，有的被放逐，有的流亡。消息传来，邹容大为激动。然而使他特别激动的，不是死难“六君子”中的四川人杨锐和刘光第这一类官员，而是主张流血变法、慷慨就义的湖南人谭嗣同。他无所畏惧地把谭嗣同的遗像悬于座旁，在上面题了这样一首诗：

赫赫谭君故，湖湘志气衰。

惟冀后来者，继起志勿灰。

诗的技巧虽不算成熟，但是，他这个仅有十四岁的少年，就如此满怀斗志，鲜明地表达了对新、旧事物的爱憎，并且呼唤“后来者”，特别是勉励自己立志走革新的道路。他的诗，是时代的脚步声。

其时或略后，邹容就读于重庆经学书院。旧时书院院长称作山长，经学书院的山长吕翼文，是个搞训诂考据的学者，尊古重道。邹容不顾那里的清规戒律，常常和同学们热烈地辩论。辩论起来，“指天画地，非尧、舜，薄周、孔，无所避”。

尧、舜是古代传说中中国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首领，以实行“禅让”制度受到后世称颂。周公是西周的大政治家，以辅佐年幼的周成王，制定《周礼》著名。孔子是春秋时的大思想家和学者。在传统的封建说教中，尧、舜是神圣的君主，周公、孔子是圣人，从尧、舜至周公、孔子，以迄孟子、朱熹，被视为一脉相承的封建道统的代表。邹容对千百年来在政治上和精神上被尊奉的这些巨大偶像，竟无所回避地给以非议和蔑视。他怎样“非”、怎样“薄”的话虽没有留传下来，但词锋所向，惊世骇俗，是无可置疑的。

1900年，邹容又因反对科场舞弊发生了楼外楼事件。

这年重庆举行府试，知府鄂芳的幕僚有个义子，品学均劣，居然名列前茅。榜发，议论纷纷，但谁也不敢去摸老虎屁股。邹容闻悉，大为不平。一天，在五福宫的楼外楼见到那个幕僚和他的义子在楼上喝酒，他便隔窗对着大骂，那个醉眼蒙眬的幕僚听到骂声，却没有认出人来。几天后，邹容又找到那个幕僚义子的住地厉声道：那天在楼外楼骂你的，就是我姓邹的，你知道吗？赶快说出你干爸爸帮你干了些什么鬼花样？义子理亏无奈，~~遂诉于父~~，义父向鄂芳控告，鄂芳派衙役把邹容抓来。~~邹容面对知府大人~~，直认不讳，并说你们徇私舞弊，~~我何以骂不得？~~鄂芳恼羞成怒，喝令衙役打了邹容二十记手心。~~邹容~~而去。

义和团运动后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，猛烈地向封建专制制度的堤坝冲来。以四太后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，迫于大势，见风使舵，居然想把“维新”的旗号接过